



敬愛的周總理
人民的偉大總理

广东化工学院图书馆

一九七七年一月

敬爱的周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敬爱的周总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已经一年了。今天，在全国亿万人民热烈欢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一周年。

敬爱的周总理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半个多世纪如一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英勇奋斗，鞠躬尽瘁，建立了丰功伟绩。他的英名，将如巍峨昆仑，浩荡江河，永世长存；他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将千秋万代为革命人民所铭记。

周总理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周恩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悼词》）

敬爱的周总理，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赤胆忠心，几十年如一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受到毛主席的无限信赖。

敬爱的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衷心爱戴和崇敬。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1976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从跋山涉水的万里长征，到深入虎穴的重庆谈判；从孕育着新中国的延安窑洞，到祖国的心脏北京，敬爱的周总理一直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耿耿丹心永不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中，周总理曾语重心长地对红卫兵小将们说：“二十多年前，主席去重庆，我陪他去，陕北打游击，我跟他一块。我有过错误，主席纠正我，教育我。我一知道错，就坚决地改。所以，我以这样的心情来爱护主席，保卫主席，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还说：“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要做到老，学到老。学什么？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是个老党员，时刻跟着毛主席，有时还掉了队。要赶紧赶上去。”（《文化大革命中对红卫兵的谈话》）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有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从革命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一九三五年一月，当中国革命面临夭折的危险时刻，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坚决支持毛主席，拥护毛主席为我们党的领袖。一九四三年，在全党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明确地向全党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同志再一次深刻地指出：“我们应当感谢毛主席，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正确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因而造成了伟大的力量，战胜了中国的强大敌人。我们号召大家学习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周总理毕生热爱毛主席，刻苦钻研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领导，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国人民中大力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他经常同干部和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亲自指挥大家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在病危时，还让工作人员反复给他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一九七六年元旦发表的两首词，并珍爱地把这两首词放在枕边，直到与世长辞。（摘自1977.1.8《人民日报》）

1945年8月2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诡计，亲自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同志从延安陪毛主席乘飞机到重庆。在那万分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为了保障毛主席的安全，在任何地方都紧紧地跟在毛主席身边。主席外出时，他一定陪同，和主席坐在一辆车上。周恩来同志对主席的关心爱护，无微不至。在平日，他总是亲自叮嘱随行人员怎样照顾主席的生活，甚至连主席喜欢吃什么菜，重庆臭虫多，要注意搞好床铺等细节都反复地交待。他亲切地教导随从人员说：“主席的一举一动，一切小问题，都是有关党的事业，有关全国人民利益的大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同志们把木板拖鞋收了起来，把住在楼内的孩子们迁了出去。一间较为阴凉靠山的屋子布置好了。周恩来同志一回到红岩村，就来亲自检查给主席准备的床铺，又到炊事班，讲了如何注意饭菜卫生，向炊事员们说：主席喜欢吃辣椒，你们每餐要准备一小碟。他还把自己的住房搬到毛主席的对门，随时协助主席工作和照料主席生活。

毛主席来到重庆以后，国民党政府派来一辆小汽车给主席使用。司机是国民党政府派来的。周恩来同志不放心，自己先去看看、坐坐。毛主席外出，周恩来同志总是同车前往，又一起回来。

1945年9月2日，毛主席、周副主席、董必武同志等，应邀出席了中苏文化协会举行的鸡尾酒会，出席酒会的有郭沫若、沈钧儒、冯玉祥、李德全、邵力子等三百余人。当毛主席、周副主席等到会时，会场的人热烈鼓掌，一片掌声，数不清热情的手，说不完的盛情欢呼。毛主席的脸上闪烁着欢乐和感激的光彩，大家兴奋地举着杯，人人都要向主席敬酒，主席的脸上已经泛起了红晕，但是仍有许多人等待着敬酒的机会。周恩来副主席怕主席的健康受到影响，就决然替代主席，干完这一杯一杯盛情难却的醇酒。（摘自1977.1.8《解放军报》）

1946年11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转战陕北的行军路上，周副主席和其他首长一样忙碌，吃得少，睡得少，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布置和安排。有时，为了分担毛主席的重任，总是睡得更迟一些，起得更早一些，除了有特急电报，总不肯惊扰主席，往往他自己睡上一两个小时，就被秘书叫醒几次。他的鞋子磨穿了，也不让人知道，怕同志们为他费神操劳。4月间，中央机关转移到靖边县的王家湾。这是个小村子，紧贴着半山坡，只有十几户人家。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都住在贫农王老汉腾出的两间半窑洞里。毛主席住在里间。周副主席睡在外间一方土炕上，找个树墩子，垫上棉袄，伏在锅台上批阅文件。任弼时同志在右面半间土炕上办公、睡觉。这两间半窑洞是连着的，走一个大门。首长们居住得这样集中，除去开会，却连一点声音也没有。主席进进出出，总是轻轻的，生怕影响其他首长。周副主席清早起来，逢到咳嗽的时候，总是到外边去。他们这种互相爱护、互相关心的精神，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每当吃饭的时候，更是彼此谦让，大家争着吃粗粮，主席坚持要吃榆叶掺面做的糊糊。周副主席一拿起榆叶窝窝头，总是笑呵呵地说：“好吃极了！”他们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日日夜夜地为全国人民谋虑着，既坦率又安然，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摘自闾长林：《胸中自有雄兵百万》及《伟大的转折》、蒋黎峰：《在毛主席周围》）

敬爱的周总理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行高于众而不有私，功高天下而不居功。他把领导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都归功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自觉地“奏第二小提琴”。这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列宁对恩格斯的评价：“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这一般说来是十分正确的。”“他对于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与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976年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一篇哀悼周总理逝世的社论说：“在毛主席掌握领导权的同时，周总理把理论指导和路线决定工作完全拜托给毛主席，自己则专心致力于毛泽东路线的实践指导上。可以说是由毛主席和周总理组合在一起的‘毛、周联合’的分担领导建立了新中国。

“周总理之所以能保持革命的一生，也是由于他那种无私、诚实的品质。他不追求最高的地位和权力……晚年，他努力培养‘革命接班人’。可以说，周总理同毛主席一起，是推进中国革命的‘车的两轮’。”

周总理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对毛主席的照顾都是无微不至的。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职工回忆说：周总理热爱毛主席，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周总理非常关心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凡是毛主席要坐的椅子，总理总是先试着坐，看看是否牢靠。党的“九大”期间，总理检查投票箱，看看距离主席的位子有多远，要走多长时间，是否有台阶。当总理发现有台阶后，立即要求垫平，等台阶垫平后，总理才放心。在“九大”会议进行过程中，大会堂的负责同志请示总理，什么时候请主席来？总理说：“不要让主席坐得时间太久。”

敬爱的周总理一贯忠于毛主席，崇敬毛主席，给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总理对他（江苏省淮安县）故居的处理，就给淮安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早在解放初期，总理要把他住过的房屋拆掉，他在淮安的亲属每次去北京，总理又总是对他们说：“房子拆了，人家就不去看了。我们应该到韶山去，瞻仰毛主席旧居。”1958年和1960年，总理曾两次对前去北京的县委负责同志严肃交代说：“房子拆掉可以盖工厂嘛！”1973年11月到12月间，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同志四次打电话（给淮安县委），询问总理故居处理情况，并

且传达了总理三点指示：一、不准参观；二、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房子坏了不准维修。总理无限忠于毛主席，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摘自《新华日报》1976年12月8日）

从“五四”运动到勤工俭学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1920年到1924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

（《悼词》）

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一段关于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记载：

“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我曾经极有趣味地研究他，因为他在中国像其他红军领袖一样，也好象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我从周氏的一个老同学以及1925——27年大革命时代这个外人称之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和他同事的国民党人那儿知道了他一些小史。我从周氏本人又知道了更多的事情。他有一点使我特别有兴趣的。他显然是中国人物中最少有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的举动与他的学识及信仰完全协调。他是一个由学者转变为叛乱者。”

“他从小就显出惊人的文学天才，所以他似乎是早就注定了要做一个学者。可是，和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在那民族意识觉醒的大时代中受教育，他对于文学的兴趣是动摇了。经过1911年第一次的革命之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开始萌芽，逐渐成长起来，周恩来也就在那时候进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

“他先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中间留学日本），后来升入南开大学。南开大、中学是美国教会在天津主办的学校，他在那儿学习英文，并获得一个自由‘教育’。他是全级的优等生，得到过三年的奖学金。后来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条件，袁世凯企图称帝，跟着来的是全中国的开始反抗，是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运动，是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因为周氏是学生领袖，他留在天津被捕，监禁一年。和他同时被捕的尚有许多爱国青年，其中有一个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思想很急进，她现在做了周氏的妻子和忠实同志”。

“周氏出狱以后，就到法国去读书。他受大战后共产主义的学说所影响，帮着组织巴黎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在同时（应为头一年）成立，所以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在巴黎读了二年书，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然后在德国又读了一年书。1924年他回到中国已经是一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他立刻到广东去帮助孙中山，那时候孙中山正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合作，准备出师北伐。”（《西行漫记》第二章）

1959年4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光辉的五四》一书记载：1919年夏，“五四”运动高潮中，周恩来同志从日本回到天津，积极投身这一反帝、反封建斗争。他负责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个刊物在1919年7月21日出版第一期，周恩来同志以《革新、革心》为题写了社论，积极宣传改造社会和改造思想的主张。这个刊物，大力宣扬了反帝，特别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野心和反封建的主张。1919年秋周恩来、邓颖超和马骏等同志在天津成立了中国学生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觉悟社”，出版了革命刊物

《觉悟》。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社员集体赴京，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座谈会，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和被邀请参加的李大钊都发了言。“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的代表，也被邀出席。会后，发表了《联合改造宣言》，提出了“团结合作”、“到民间去”的口号。

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的革命活动，国外报刊也有大量记载。1976年1月8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奥·惠特曼和《华盛顿邮报》斯坦利·卡诺的介绍周总理生平的长文章，对周总理青年时代都有详细记述。下面以卡诺文章为主，摘录如下：

“周于1898年生 in 江苏省淮安，他的外祖父定居在那里，并成为当地著名人士。但是他始终认为他的祖籍是离上海不到一百英里的浙江省（绍兴）的保佑桥村，他的家族的祖先曾在几世纪以前到达那里。”

“周的母亲死得很早，是一个在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和书法方面很有才能的妇女。……在周的母亲去世后他的家人把他从贫困潦倒的父亲身边接走，交给在上海的一个伯父抚养。他的伯父自己没有儿子。当时周大约八岁。”惠特曼的文章也说：“周十岁时，另一个伯父负责教养他，把他带到沈阳，他在那里上完了小学。他在家里和学校里接触了中国一些改革派和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还学了一点英文。”

“1911年周十三岁的时候，孙逸仙宣布成立了第一个中华共和国。在对正在土崩瓦解的帝国君主制进行的这个挑战的启发下，许多中国青年拒绝接受传统教育，设法到现代的西方学校去读书。周不顾家庭反对，选择了沿海城市天津的一所不遵守旧制度的寄宿学校南开中学。他在那里念了四年。”

“在南开中学，周进一步提高了他的政治判断力和领导才能。他帮助组织了一个学生会。他用飞飞的名字在学生会的报纸上写文章，鼓吹爱国主义、自由、工业化、团结，甚至鼓吹自由恋爱。他还学校里演戏……。”

“1917年，他到日本去，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京都大学继续学习。周在京都大学受了河上肇教授很深影响，河上肇是社会主义者，日本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权威。”（1976年1月10日，日本《读卖新闻》晚刊高木健夫的文章记载：“周总理作为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一员到巴黎留学之前，曾在早稻田大学法政系学习过一年或一年半。七、八年前，当我乘出租汽车通过牛进大曲附近的时候，司机告诉我说：‘乘客先生，从前面的一条街往左拐的地方，就是现在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居住过的宿舍。’”“周恩来的所到之处，连出租汽车司机都知道，并成为东京的一个新的名胜地，是意义深远的。”）

“1919年，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决定把德国战前在中国北方山东省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起了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广泛抗议运动。周当时二十一岁，决定参加抗议，匆匆离日回国。”

“回到天津后，他入了南开大学，但是却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那里和附近的北京进行政治活动。他从事活动的工具是天津学联。天津学联的妇女组织天津妇女爱国协会，是由邓颖超领导的，邓后来作了周的夫人。”

奥·惠特曼的文章说：“周回到了天津，在那里，他担任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观点的‘觉悟社’的机关刊物《觉悟》的主编。这个社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类似的社团是1921年年中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主根。”

卡诺的文章说：“1920年1月周和他的同志们抗议警察把学联报刊停刊的行动时，他们很快就被捕了。周在狱中关了四个月。”“出狱后，在1920年年中离开中国前往法

国（勤工俭学），目的是进一步学习。但是他在欧洲的四年里，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组织其他中国留学生和吸收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在这段时间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成为它的一位领导人。这个青年团是培养潜在的党员的一个组织，后来本身变成了共产党。”卡诺的文章还说：“他以共产党青年团领导人的身份，经常到德国去。他在那里同当时三十六岁的四川省军人朱德有了联系。”

“他在欧洲时，遇到了许多未来的亚洲革命家，其中有越南的胡志明。周有一次谈到胡时说，‘他是我的老大哥’。后来参加革命的一些中国人，也是他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朋友和同事。”

1976年1月11日南斯拉夫《信使报》说：“周最初是巴黎大学生，后来是利尔煤矿和雷诺汽车厂的工人”，“于1924年回到中国”。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24年到1926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1926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悼词》）

周总理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周恩来同志于1924年按照党的指示，从巴黎回国，到达广东，担任中共两广区委的委员长。他一踏进广州就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贯彻“三大”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1924年10月，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武装——商团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妄图将当时广东的革命政府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广东革命政府处于危急的关头，中共两广区委发动广州各界革命群众，于10月10日，在第一公园（现中央公园）召开反对反动商团的示威大会。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和指导这次大会，在会上他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满腔义愤地揭露了商团卖国行径，鼓舞革命群众对商团进行坚决回击。并针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软弱动摇，周恩来同志强有力地指出：“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很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决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在商团叛乱中，周恩来同志就是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思想，在反革命商团刀枪林立、街垒四布中，毅然带领革命群众对敌人勇敢战斗，平定了商团叛乱，粉碎了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颠覆阴谋，取得了反帝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牢牢掌握了我党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924年秋，周恩来同志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在军校紧紧依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大

力宣传马列主义。周恩来同志在军校作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演讲，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与反动军阀的根本区别。并根据毛主席关于党要掌握革命武装的思想，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

1925年2月，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黄埔学生军出师东征。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援下打垮了反动军阀陈炯明的主力。这时，驻在广州地区的滇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叛乱。周恩来同志闻讯，立即率领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镇压了杨、刘叛乱。10月，陈炯明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支持下，死灰复燃，重新向革命进攻。为了统一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东征军中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教导团，在东征多次战役中一直冲锋在前，英勇无比，在攻克惠州一带中尤为突出。毛主席曾经指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指教导团），便已团结许多军队在它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为一个军，影响更多的军队。周恩来同志为东征军制定了严明的纪律，规定不拉夫、不筹响、不强占民房，深得群众拥护。群众称为“真正革命军”、“真正卫国保民之革命军。”

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北伐军独立团，被人民誉为“铁军”。这支“铁军”，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建立起来的。1926年5月，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军先锋，首先开赴湖南前线。5月1日，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到达广州。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召集连以上党员干部到司后街（现越华路）开会，并作重要讲话。周恩来同志首先向到会的同志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北伐的重要意义和有利条件，并介绍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还具体指示要加强党的领导，做好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注意发动群众，注意统战工作。周恩来同志最后以“饮马长江”这句话，鼓励大家，信心百倍地说：“武汉见面”。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极大鼓舞了独立团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攻打武昌时，独立团担任主攻任务，个个精神抖擞。一营营长、共产党员曹渊和几位连、排长，身先士卒，英勇牺牲。为了表彰烈士的英勇事迹，周恩来同志指示要撰写曹渊烈士等的传略，以鼓舞后人。

1926年，毛主席亲自主办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为我党培养大批干部，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26年5月，周恩来同志到农讲所当教员，担任《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课程，成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1926年12月，周恩来同志离开广东前夕，在中共两广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论述了农民运动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重大意义，热情歌颂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驳斥了右倾投降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对农民的污蔑，愤怒谴责了地主、军阀操纵民团摧残农会的罪行。他大声疾呼：“民众武装十分重要，……农民自卫军……为势所必需。”（摘自《在大革命的峥嵘岁月里》《广州日报》1977.1.8）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关于周恩来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活动，有如下一段记载：

“在二十六岁那年，周氏已经成为广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他是著名的黄埔军官学校的秘书，是加仑将军——那时加仑将军是黄埔军官学校的首席顾问，现在（指1935年）他是苏联远东红军的总司令——的心腹。黄埔的校长蒋介石虽然把周氏视为眼中钉，但是因

为他在急进的学生中间具有很大势力，也只好委他做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周总理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3月，震撼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由周恩来同志和康生、赵世炎、罗亦农等同志组织和指挥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中央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同志兼任江浙区军委书记，参加这次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

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同志的领导下，上海的党和工会组织展开了紧张的第二次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

“武装起义的第一步是认真地整顿起义队伍。至1927年2月底为止，上海工会会员发展到二十八万九千余人，纠察队员已有五千人，其中有武装的150人。于是，按地区编成若干大队和中队，每天夜里进行操练，周恩来同志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当中去指导训练，并亲自教工人练习射击。”

“3月中间，北伐军沿沪杭路向上海推进，20日傍晚，占领了上海近郊的新龙华。驻守上海的奉系军阀毕庶澄部计三千人，军心动摇，警察两千人更无斗志。这时，上海的工人和市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已达到顶点。区委认为：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的有利时机已成熟了。3月21日早晨八点，区委召集各部部长开紧急会议，宣布：在当天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一点开始军事行动。周恩来同志和赵世炎（即施英）同志任起义总指挥，罗亦农同志是区委书记，汪寿华同志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康生同志是闸北区委书记。起义地点分七个区，闸北是起义重点区。”

“当时起义总指挥部设在闸北宝山路南端一所房子里。”

“21日中午十二点不到，有的工厂提前罢工了。一小时内，全市八十万工人纷纷跑上街头，按预定地点集合起来。盖天压地的歌声和口号声，震动着整个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下，起义爆发了，全市枪声大作，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在各路工人纠察队的勇猛攻击下，铁路和电线断了，电话局和电报局被占领了，赤手空拳的工人逐渐夺得武器，增强了攻击力量。一些敌人用竹竿系着白手巾投降了，平时欺压人民的警察剥掉了黑制服，四下逃窜。马路上到处是街垒，饭店的店员为战士赶制馒头，袖戴红十字的男女济难队员，往来于前线后方，将伤员战士抬下火线。”

“这时，总指挥部在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着，周恩来同志和赵世炎同志在西厢里，一会儿伏在桌子上的市区地图研究敌情和调配工人武装；一会儿听取联络员报告，指示行动。谱写现代史上光辉的一章。”

“当战斗开始后，汪寿华同志奉命乘车到龙华，请北伐军急速进攻。但他们却别有用心，按兵不动。英雄的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同志带领下，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深信在经过多次演习和长期准备之后，要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夺取上海。”

“下午两点，南市和虹口战斗先后结束。接着浦东、吴淞、沪西也相继结束，各区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区临时市民政府。下午四时，闸北纠察队在康生同志指挥下，也消灭了第五警察署、广东街分署、中华新路分所和湖州会馆，起义总指挥部移至第五警察署。这时，敌人在全市只剩下北站、商务印书馆和天潼庵车站一线上的三个点，仍在负隅顽抗。”

“周恩来同志决定，将队伍作适当调配，战术上也作必要的改变，集中兵力，各个击

破。对北站取守势，对商务印书馆包围，集中兵力先消灭天潼庵车站敌人。晚上，巷战逐渐激烈，三个点敌人疯狂作垂死挣扎，向工人纠察队反扑。英帝国主义铁甲车也从背后袭击工人武装。但是，工人纠察队在党的领导下，怒火万丈扑向敌人，青壮年也自愿参战。周恩来同志冒着硝烟炮火，在通宵激战中，不时亲自上街指挥作战。”

“经过彻夜围攻，被包围敌人已疲困不堪，工人纠察队越战越猛，并发动全面进攻，22日中午，天潼庵车站敌人挂起白旗投降，三百多人作了俘虏。下午四点，商务印书馆敌人也被消灭。下午六点，武装纠察队全部占领北站。至此，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用150杆破旧枪枝、三颗炸弹，血战三十个小时，全歼三千奉鲁军阀和两千警察，夺取了上海。而一直按兵不动的国民革命军，后来却不费一枪一弹，进驻了上海。”

这时，篡夺了北伐军领导权的卖国贼蒋介石正在暗中组织反革命政变。当时在上海的陈独秀一味投降、妥协，1927年4月5日，和汪精卫发表了可耻的“联合宣言”，在敌人磨刀霍霍的时候，还说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还多方限制和束缚工人手脚，要对刽子手“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更加助长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气焰。4月11日，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被青红帮杀害。12日，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反革命政变。4月13日，全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二十万人的大罢工，示威游行，在宝山路被蒋介石反动军队开枪屠杀，死数百人。周恩来同志参加了闸北的群众大会和游行，亲自经历了这次惨案，表示了无比的愤怒。（摘自夏之栩同志的《记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的赵世炎烈士》）

“自1925年到1927年，（北伐军）军事上获得空前胜利。周恩来奉命到上海组织民众，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那时候，他还只有二十八岁，既没有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也没有和劳工阶级接触的经验，既没有怎样预备暴动的指导著作，也没有随身的顾问。周氏跑到上海，只带了革命的决心和马克思主义的健全的理论。”

“在三个月内，共产党组织了六十万工人，发动一次总罢工。”“可是暴动是未曾实行的。工人没有武装，也没有训练，不懂得怎样去‘夺取城市’。他们还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怎样组织工人的武装核心。”

“周恩来和上海著名的工人领袖如赵世炎、罗亦农等到底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某个地方，秘密地对二千个干部人员实施军事训练。偷运的步枪和训练成功的三百个射击手，这就是上海工人所有之唯一的武力。”

“1927年8月21日，共产党发动总罢工，上海的工厂完全停工（这样的有组织有斗争精神，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六十万工人全体起来做革命的后盾。他们先占据了警察局，跟着又占据了兵工厂和警备司令部，终于获得了胜利。五千工人武装起来了，六营革命的队伍组织起来了，‘上海市人民政府’也跟着宣告成立。”（埃·斯诺《西行漫记》）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我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个篇章，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翻天覆地的英雄气概。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特别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出卖而失败。但是，它的英雄业绩，将千秋万代为中国人民所铭记。1958年，周总理以严于律己的谦虚态度，回顾了这次起义，他说：“那次我负责领导武装暴动，但是我缺乏经验，也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力量关系。我是出身于封建家庭的一个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过生产的经济过程，所以同工农群众没有什么接触。我是在国外投身革命事业的，那时只是从书本里得到很有限的革命知识。”（摘自1976年1月9日美联社记者罗德尼克的报道）

领导“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刘伯承、叶挺、贺龙、聂荣臻、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江西南昌率领在党的影响下的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作了科学的总结，指出：“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1927年7月15日，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也正式决定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周恩来同志受党中央派遣，任南昌方面前敌委员会书记。他带着陈赓等同志，于7月下旬，从武汉秘密乘船到南昌，负责筹划南昌起义。

当时，我们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有驻在九江的叶挺同志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驻在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张云逸同志任参谋长，周士第同志任七十三团团长），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十军。南昌方面有朱德同志领导的军官教育团。卢德明、罗荣恒同志领导的二方面军警卫团正从武汉赶往南昌的途中。周恩来同志到达南昌后，住在朱德同志的寓所——南昌花园角二号。接着，刘伯承、聂荣臻、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等同志和十一军、二十军领导起义的同志叶挺、贺龙同志都到了南昌。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同志主持成立前敌委员会，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具体部署。七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到贺龙同志指挥部，由于贺龙同志当时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郑重通知他决定起义，他激动而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同志当即代表前委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南昌市中心洗马池江西大旅社，周恩来同志等就在这里具体指挥起义的战斗。决定七月三十日行动。就在这一天，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匆忙赶到南昌，以种种借口阻挠起义。周恩来同志义正辞严驳斥了张国焘的投降主义，坚决表示，暴动不能停止。我党要独立领导暴动，不能依靠军阀。决定八一晨起义。由于组织的严密，只四个小时，便解决了战斗。起义军发布了《八一革命宣言》和《八一革命宣传提纲》。南昌起义的这个光荣日子——“八一”，以后被作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部队后来虽然在潮汕失败了，但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却由此诞生。在毛主席建军路线指引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组织、教育培养和指挥下，建立了与人民血肉相联，鱼水相依，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英勇顽强，机智灵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人民军队。周恩来同志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昌起义胜利后，起义部队从八月五分左右，陆续离开南昌，向广东进军。十九日，占领瑞金。前委在瑞金决定，必须先歼灭会昌钱大钧等敌军，才能向广东进军。前委指挥部设在南山岭一五三一高地，周恩来、刘伯承、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冒着敌人的炮弹，亲自指挥作战，周恩来同志对参加进攻会昌的二十五师干部作政治动员，鼓励他们不怕疲劳，坚决拿下会昌，扫清进军广东的通路。

当时在二十师工作的周士第同志在三十一年后，回忆在会昌城外见到周恩来同志的情景说：“好多天没有见到周恩来同志了，看来他似乎瘦了些，但精神仍是那么好。他工作忙得很，日以继夜的操劳，大家经常谈论他这样艰苦的工作精神。今天在指挥部见到他，心里非常高兴。他那种坚强的意志，艰苦的作风，和蔼可亲的态度，更增强了我们的勇气和胜利的信心。”

在周恩来、叶挺等同志指挥下，起义军经过反复冲杀，击溃钱大钧部敌军，占领了会昌，并打退了反扑的桂系军阀黄绍竑部。然后，经汀州、上杭，向广东潮汕进军。9月23日占领潮州，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汕头工农也起来暴动。这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徐景堂、黄绍竑、钱大钧等部，已从四面八方涌到那里。起义军占领潮汕后，即在汤坑、潮州、三河坝等地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军舰也向汕头猛攻。9月30日，我军被迫放弃汕头，竭尽全力到汤坑御敌。当时，周恩来同志生病发烧高达四十度，还在前线指挥作战。朱德同志指挥二十五师守三河坝。终因敌众我寡失败。当起义军向海陆丰前进的时候，在普宁流沙遭到敌人的袭击，指挥系统被击断打散了。周恩来、叶挺等同志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先后从海丰到了香港，叶挺同志不久到广州和叶剑英、张太雷同志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周恩来同志住在香港荷里活道木工聚居的一间木楼内，几天之后，从香港去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地下工作。

（摘自聂荣臻、陈赓、周士第等同志关于“八一”起义的革命回忆录，及香港《文汇报》1976年1月12日《香港木工怀念周总理》）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12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行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传记》）

参与组织领导万里长征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毛主席和党内的一些同志，越来越相信农民对革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27年起，毛主席发展了这一观点。这和共产国际的立场有根本的分歧，因为共产国际主张把革命的基点放在工人阶级（城市）。这一分歧是毛和苏联共产党人之间往往是激烈的理论争议的症结所在。”

“毛在偏僻的井冈山创建了农民和游击队的根据地，后来，根据地转移到江西省，1931年在江西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周对（共产国际把革命基点放在城市的）这种方针越来越怀疑。在1931年终于到江西根据地同毛会合。”（《纽约时报》记者奥·惠特曼1976年1月8日文章）

“周恩来同毛主席一道尽最大努力打垮了国民党军队的犹如滚滚浪涛般压过来的包围。在战斗中，周总理看出毛主席才是应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人物。从那以后长达四十年的岁月里，他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发挥了作用。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方是长征途中的（贵州省）遵义。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说：‘今后，把红军的领导权交给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的道路。’支持确立毛主席的领导权。”（日本《每日新闻》1976年1月9日社论）

奥·惠特曼记载说：江西苏维埃在蒋介石对它发动至少四次“围剿”的情况下，直到1934年为止，共产党人在江西的地位一直被认为是巩固的。后来，蒋聘请了一位德国将军

汉斯·冯·塞克特来督导又一次“围剿”。他决定采用合围战术。随着塞克特的合围圈的收紧（应当说，由于不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的危害——摘者），共产党领导人一致决定向西北突围。部队在1934年10月离开了江西，开始了后来所说的长征，经过一年的行程到达延安的窑洞，在作出长征的决定以及在沿途的日常计划安排方面，周和毛都积极合作的。周的谆谆说服和铁的纪律，帮助了这支共产党军队完成了这次史诗般的迁移。

1976年1月11日，美国纽约《华侨日报》刊载了美籍著名医生李振翩哀悼周总理的文章，文章说：“我于1972年7月29日晋见周总理，他给我讲了一些万里长征时的故事，……当红军抵达遵义时，设在贵阳的敌人总指挥部决定要全部消灭红军，当时敌人兵多、武器精良，红军情况颇危急。毛主席决定设计骗敌，假装反攻湖南。敌果中计，集重兵于湘黔边境；要待红军来时，一举而消灭之，待敌人布置差不多完毕了，毛主席半夜下令急行军，西往云南。敌人发觉上了当，要派兵追去；时间相差十天，已追不上了。红军打到云南北部时，先锋离昆明仅三十华里。敌将薛岳，集中军队，死守昆明。毛主席又半夜下令急行军进入四川。要渡江，便一举击溃防守渡口的敌人，当薛岳追兵的先锋到达毛主席的原住地时，毛主席已离开三天了，——这些故事是周总理告诉我的。后来我从他处得着一些消息，知道策划的是毛主席，执行这个计划的主要是周总理”。

在万水千山的长征途中，周恩来同志和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心贴在一起，汗流在一起，同甘共苦，战胜困难。戴镜元同志在《长征回忆》中记载“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17日，到达贵州黎平后，部队粮食很艰难，国民党县政府逃窜时，仓库里虽然存了一些稻谷来不及烧毁，但黎平的工农群众穷到连碾磨也没有。地主豪绅的碾磨也都隐藏起来或者破坏了，有了谷子，磨不出米粒也煮不成饭啊。为了克服困难，周恩来副主席为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要我们每人拣一块大石头作碾盘，小石头作碾子来碾谷子。有的同志用两块瓦片搓，有的同志干脆用手搓。周副主席在工作异常繁忙中，也抽出时间用两块瓦片和大家一起搓。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也来搓谷子，情绪更加高涨，即使手搓出血泡，也很愉快。就这样，上下一齐动手，解决了当时的吃饭问题。半个多月没吃过大米，自己搓出来的糙米稀饭，吃着格外香甜。”

1935年夏，红军从贵州兴仁、兴义地区向云南西进，有一天沿着一条小河走路，那天天气酷热，喉咙发干，总想找点水喝。但是，司令部通知说，这条河水有毒，不能喝。嘴唇都裂开了，看着银带似的河水，也不敢喝一口。一连翻了一山又一山，翻了十几座山，到了一个土豪的庄园，家里有很多烧酒，会喝酒的同志都争着以酒解渴。当时在中央军委司令部电台工作的戴镜元不能喝酒，因为实在渴的忍不住了，也喝了两口润喉咙。谁知走不了多远，就头重脚轻，倒在路旁树底下睡着了。当时敌人前堵后追，掉队是不堪设想的。戴镜元在朦朦胧胧里，恍惚觉得有人摇了他一下，睁眼一看，啊！原来是周副主席在面前，旁边站着两个警卫员，有一个警卫员还牵着一匹马。他们看见戴镜元倒在路旁睡着，就把他叫醒。戴镜元怪不好意思，赶紧站了起来，但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站不稳。周副主席早已看出他是酒喝过头了，戴镜元也是老老实实把口渴没水，喝酒醉倒树下的情况谈了一下。周副主席不但不责备他，还慈祥地叫他骑上自己的马走。警卫员牵过马来，扶他上马，周副主席还说：“上马吧，好好骑着，我们一起走。”周副主席怕戴镜元摔下马来，要警卫员牵着马跟着一块走。戴镜元心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很多年以后，戴镜元还说：“我每想到这件事情，内心当即涌起温暖的热流，顿时感到增长了无穷的力量！”（摘自戴镜元《回忆长征》，1961年北京出版社版）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长达两年的红军长征，是中外历史上空前的壮丽史诗。长征中，红军斩关夺隘，抢险飞渡，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摘自刘伯承《回顾长征》）据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章中记载：在沿路上，平均几乎每天有一次小接触，有十个整天的大战。中央红军在路上的三百六十八日中，二百三十五日耗在白昼行军中，有十八日耗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一百日中——有许多是用作战上的，有五十六日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二万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四十四天的休息，平均每走三百五十里才有一次休息。每天的平均行程是七十里即二十四英里。红军一共走了十八个大山岭，有五个是终年积雪的，他们渡过了二十四条河流，他们经过了十二个省，占领了六十二个县，冲破十省地方军阀的围攻，通过六种少数民族地区。

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在毛主席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参加了全军的组织领导工作，每一次重大战役，他都亲临前线，具体指挥。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一、三军团渡过北盘江，兵分两路，浩浩荡荡直扑云南，翻山越水，势不可挡地逼向昆明。给敌人造成进攻滇系军阀老巢的假象。正在敌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中央军委突然命令红军主力两路向西北转进，直趋金沙江。周恩来同志亲自指挥了抢渡金沙江的战斗。

四月的云南已经很热，两边小山上，红花绿叶，灌木丛生。在这个迷人的春天，谁能想到后边仍有几十万追兵？但谁都相信，毛主席、中央军委会指挥红军摆脱敌人，走向胜利。

一天晚上，部队在一个村子里宿营。半夜，当时在干部团担任连长的肖应棠起来查哨，走到中央首长住的院门前，看到里面还有灯光闪动。这么晚了，哪位首长还没有睡觉呢？正在向哨兵询问，忽然从里面出来一个人，越走越近，到跟前才看清是周恩来同志。肖应棠立正问道：“副主席还没有睡觉吧？”他说：“还没有。查完了哨吧！来，进来坐一会儿。”

这是一所地主的宅院，房子比较整齐。周副主席住的屋子里摆着几把古式的椅子和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摆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和几样简单的文具，另外还放着一个小纸包。墙挂着一张大地图。看来，副主席是在研究进军路线。在暗淡的灯光下，副主席的脸显得又黄又瘦，眼也不如以前奕奕有神。唉！首长们劳累太厉害啦。

坐下以后，副主席问肖应棠说：“你们五连还有多少学员？”回答说：“在遵义，土城战斗中伤亡了一些，现在还有一百二十多人。”接着又问到五连的行军情况，学员情绪，武器装备情形，肖应棠都一一地作了回答。副主席沉吟了一会儿，笑着说：“你们五连在遵义、土城打得很好，要保持这个光荣呀！”说完，就打开桌上的纸包，要肖应棠吃饼干。肖应棠知道，这是警卫员给副主席预备的夜餐。在当时能弄到几块饼干是非常不容易的，肖应棠急忙说：“我晚饭吃多了，现在肚子还发胀呢。”副主席把纸包推到肖应棠面前，再三要他吃，只好拿了小半块，一边嚼，一边等着副主席问话。但副主席仍象在考虑什么，一直没有说话，最后才说：“好吧！不早了，休息去吧。”

肖应棠从屋里出来，心中猜疑不定：副主席这样详细地了解连队情况，是随便问问呢，还是在挑选执行什么重要任务的对象？想到这里，他又后悔没有大胆地问个明白。

第三天中午，干部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把肖应棠和指导员叫了去，以命令的口气说：“中央决定我军北渡金沙江，并把抢夺绞车渡渡口的任务交给我们团。我团决定了二营为先遣支队，你们五连为前卫连。你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尽可能迅速地抢夺渡口，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准备好马上出发！”陈赓团长并交待中央派一个工作组和前卫连一同前去执行任务。

部队沿着通往金沙江的小路出发了，一路上虽然山路崎岖，有时根本没路，仍以每小时十多里速度走了一个通夜，赶了二百多里，第二天太阳落山时赶到江边。乌黑的一座大山横在前面，金沙江象一匹摊开的灰布，看不清哪是河水，哪是沙滩。前卫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抢占了绞车渡口，又赶了四五十里，控制了制高点。接着，中央和一、三军团的千军万马都从这里过了金沙江。肖应棠这才明白了：啊！出发之前，周副主席深夜不眠，并了解连队情况，原来不只是考虑中央纵队，而是全军行动呀。想到这里，他不觉一阵兴奋。

（摘自肖应棠《巧渡金沙江》）

在干部团抢占绞车渡口的同时，红三军团也自驛江渡过了金沙江。可是，那里水流湍急，架设的浮桥被水冲垮。军委令三军团改从绞车渡过江。三军团前卫团十一团刚到江南岸，正在山上休息，传来了命令，要团领导人张爱萍速带一个营和侦察排、电台渡江，到北岸渡江司令部军委周副主席处领受任务。

张爱萍率第二营和团侦察排过了江。一上岸，便见到周副主席，他关切地问了部队情况后，简要地讲了一下整个战局，分析了当前的敌情，然后授予任务说：沿着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江驿以南的龙街渡口，阻击由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红军渡江后在会理短期休整和继续北进。同时，要沿路注意联络南岸一军团的部队，转达军委令他们火速赶到绞车渡渡江的命令。

黄昏前，红十一团接着周副主席的命令，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翻山爬崖，溯江而上。

四天后，我军全胜胜利地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包围、追击和堵截，把敌人全部抛在金沙江以南；从容北进，直达天险大渡河。（摘自张爱萍《从遵义到大渡河》）

1935年5月29日，一军团红四团在政委杨成武和总支书记罗华生等指挥下，夺取了天险泸定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带着千军万马渡过了大渡河，粉碎了敌人幻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迷梦。

8月，红军征服了雪山以后，在毛儿盖一带待命，前面是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草地。党中央决定北上过草地。当时，周恩来同志身患肝脓肿的重病，红军指战员都非常关心。担任过草地前导任务的杨成武同志，接到毛主席要他们过草地的指示后，赶紧去看正在患病的周副主席，因医生禁止探望，只见到邓颖超同志。邓大姐详细地告诉杨成武周副主席的病况，并要他转告同志们不用悬念。当时药物奇缺，粮食极度困难，眼看就要向草地进军，周副主席的病确实叫指战员们担心！大家多么希望他快点恢复健康啊！（摘自杨成武《飞夺泸定桥》、《毛主席指示我们过草地》）

周恩来同志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仍然忘我地坚持工作。有一次在行军途中因昏厥从马背上摔下来。毛主席、党中央非常关心他的病，命令用银元在四川大山里买些白木耳补养治病。但周恩来同志在自觉症状稍有减轻后，就不让再煮，甚至连米粥也不许煮，坚持要和战士们一样吃南瓜、野菜。

周恩来同志对张国焘的叛党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决维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北上陕北抗日的主张。据当时在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在毛儿盖休整时，周恩来同志带病天天开会，昼夜操劳，除了同毛主席研究过草地的问题外，更多的时间是对张国焘进行教育和挽救。但是，张国焘这个叛徒，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当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右路红军通过草地到达四川巴西时，张国焘自持兵多，率左路军到四川阿坝地区后，不单

不肯继续北上，反而妄图以‘武力解决’中央。当时在右路军中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发觉张国焘的阴谋，马上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机立断，率一方面军指战员，连夜北上，脱离了险区。

1935年11月下旬，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中央红军，在陕北东村一带和徐海东、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师。毛主席亲自领导拟定了直罗镇歼灭战计划。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亲临前线指挥，指挥所设在距离直罗镇不远的山坡上。主席一再嘱咐说：要的是歼灭战！

战斗不到两个小时，红军两路会攻，占领了敌人109师师部所在地直罗镇，敌师长牛元锋逃到镇东头的小寨里，指挥着一个多营顽抗。

在直罗镇战斗正进行的时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罗瑞卿同志来到枪声未息的战场。他们边走边看，看到散兵坑里的伤员。他们不停地慰问。毛主席还拿着水壶，一个挨一个地将水送到每个伤员的嘴边，一会儿担架来了，毛主席看到担架都是硬梆梆的木板钉的，皱皱眉头，说：“来，咱们去检点东西铺在担架上，让他们躺得舒服些。”说罢和其他首长一块到附近小树林里去拾敌人丢下的破大衣、破被褥，又拾了一些枯树叶。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回来后，亲自在担架上铺了厚厚的一层大衣和被褥，比睡觉的铺还松软。然后，又把伤员从散兵坑里扶起，搬到担架上，又给伤员盖好身上的大衣，插上伪装树枝，看着把伤员送去后方。

周副主席又到红十五军团的阵地。红军正猛攻敌109师的残敌，这里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周副主席同其他同志从山上走下来，他们都拿着望远镜，边走边向敌人固守的小寨子观察。周副主席和红十五军团的干部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了攻击的情况。最后周副主席指示：“敌人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不好攻暂且围着算了。寨子里既没粮，又没水，他们总是逃跑的，争取在运动中消灭它。”

果然，敌人待援无望，趁黑夜向西突围逃走，红军一气追了二十五里，在直罗镇西南的一个山上，全歼残敌，活捉敌师长牛元锋。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摘自徐海东《奠基礼》和游好扬《毛主席扶我们上担架》）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清晨，西安附近的华清池畔，响起了一片枪声，揭开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全国抗日运动，特别是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在西安拘留了蒋介石。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亲日派以何应钦为首，主张下令“讨伐”张、杨，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自己取而代之；亲英美派以宋子文，宋美龄兄妹为首，主张营救，反对马上“讨伐”。各地方实力派头目也从自己立场出发，企图从中渔利。“西安事变”后的局势，是十分复杂的，斗争十分尖锐的，前途是十分艰危的！

党中央、毛主席正确地分析了事变后的局势，英明决定了党的基本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国民党左派，争取其中间派，反对和揭穿亲日派利用拥蒋、发动内战的阴谋，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同情张、杨，给予积极的援助，切实作好准备，对付亲日派的武装进攻。派出周恩来、叶剑英、

秦邦宪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前往西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申伯纯：《记“西安事变”》）

贺清华同志在《跟随毛主席去延安》一文中，有一段生动回忆：

193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轮到我值班。夜深人静，主席正在聚精会神的工作，叶子龙同志送来一份电报。我给主席送开水，主席看完了电报对我说：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住了。我高兴的几乎跳起来，扭身要走，打算把好消息告诉同志们。主席笑着招呼我说：

“不要走，不要走，还有事情呢，你赶快去请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博古同志到这里来。”

听说抓住蒋介石，有人主张宰掉，有人主张戴高帽游街……。

主席窑洞里的会议，直开到天亮。不一会儿，通知要在保安修飞机场。我心里想一定要用飞机把蒋介石送到保安来。

后来，飞机场不修了，第三天一早周副主席便离开保安城。我问主席：“主席，飞机场怎么不修了？不把蒋介石送来了？”

主席爽朗地笑了，说：“啊，不是这回事，不是把蒋介石送到保安来关窑洞，修飞机场是张学良、杨虎城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代表。周副主席已经到西安去了，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不但主张杀他，还主张放掉他呢！”主席又说：“现在不能把蒋介石关窑洞，更不能杀他，亲日派何应钦之流正想利用‘西安事变’，搞掉蒋介石，挑起全国范围的内战。杀了一个蒋介石，还有第二个蒋介石。民族危亡，抗日第一。”针对有些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想不通，主席在抗大一次讲话中，形象地说，陕北人要毛驴上山，用一拉、二推、三打的办法，要蒋介石抗日，也要用对毛驴的办法。

（《人民日报》76年12月23日）

龙飞虎同志在回忆录中说：1936年12月15日，周副主席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托，离开了保安。

那天，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的棉军装，蓄着又长又黑的大胡子，两只眼睛炯炯发光，我刚见到他时，确实有些畏缩，副主席骑的是一匹枣红大马，二十几个警卫员骑着蒙古马，冒着北风，踏着白雪向延安进发，从那里转乘飞机。当晚，住在一个村庄上，副主席一直忙着招呼别人睡觉，又问我们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他听我们回答后很高兴，鼓励说：“好嘛！以后还要努力学习。”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早上那畏惧心理一下子没有了。

当时延安还在国民党手中，不让我们进城，从杜甫川羊肠小道绕过去，又窄又滑，只能下马步行。我怕副主席滑倒，想去搀他，他笑了起来说：“嗨！你们真把我当老人了，我可不比你们这些小青年差劲，不信来比比看！”说着，就在陡滑的山道上轻捷地走起来。

离开保安的第二天（12月17日）下午一点，我们随副主席坐上张学良的座机从延安起飞，一个小时以后到了西安。进城后，我们先在东门一个王铁匠家休息，因为快要和张学良见面了，有些同志对副主席说：“把胡子修一下吧。”副主席说：“干脆剃了吧。”当时红军生活艰苦，连刮胡子刀都没有，副主席就用一把大剪刀，对着镜子剪起来，胡楂子长短不齐，可副主席却挺满意。后来，张学良见了，还很惋惜地说：“唉，这么长的胡子，剪掉多可惜！”

周副主席到西安后就忙碌起来，每天出去很早，回来很晚。那几天，西安形势也确实紧张，东北军的官兵气愤填膺，一致要求把蒋介石杀掉。南京的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周副主席整天不休息，不是和杨虎城、张学良谈话，就是和蒋介石谈话，